

译文纪实

THE LAST PANDA

George B. Schaller

[美] 乔治·夏勒 著
张定绮 译 胡锦涛 校

最后的熊猫

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权信息

- 书名：最后的熊猫
- 作者：〔美〕乔治·夏勒
- 译者：张定绮
- 责任编辑：莫晓敏
- 关注微博：[@数字译文](#)
- 微信公众号：数字译文
- 联系我们：hi@shtph.com
- 问题反馈：complain@shtph.com
- 合作电话：021-53594508

中译本修订序

夏勒 (G.B.Schaller) 博士曾任纽约动物协会保护部主任，是国际著名的保护生物学家。他一生涉猎广泛，先后研究过非洲大猩猩、狮、印度虎以及喜马拉雅野山羊等物种。在中国，夏勒与我合作研究卧龙的大熊猫更达五年之久。在此期间，我与他在中国西部大熊猫栖居的遥远山区中同住、同吃、同工作，留下了诸多美好回忆。夏勒挚爱野生动物，研究细致严谨，善于记录分析，并有乐观积极的工作作风，令我很是钦佩。

《最后的熊猫》是继《卧龙的大熊猫》之后的一部叙述性著作，忠实地记录了作者进入中国寻踪大熊猫家族的来龙去脉与酸甜苦辣，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书中作者对大熊猫这一独特物种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尤引人注目。该书语言流畅，叙事生动，在带领读者步入大熊猫家族神秘生活的同时，也能唤起关爱自然、保护大熊猫的社会责任感。

在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已成基本国策，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等生态工程的实施为大熊猫生存环境的改善创造了良好条件，野生大熊猫栖息地面积已达两万多平方公里。在个体数量方面，野生大熊猫种群在经历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衰退之后，到二十一世纪初已达约一千六百只，目前估计已近两千只。在遗传多样性方面，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魏辅文研究员等通过微卫星分子标记、宏基因组学等研究手段发现当代野生大熊猫仍保留着较高的遗传多样性和进化潜力。因此，当代大熊猫的未来仍颇为乐观。

我和夏勒博士都已是耄耋之年，今乐见他所著的《最后的熊猫》中文译本重新审定出版，欣慰之余，特为之序。

 教授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四日

于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纪念 彼得·斯科特爵士

一年又一年过去，总听见刀斧砍伐最美丽的树木的声音。中国本已残缺不全的原始森林，遭破坏的速度快得令人遗憾。树砍了就再也不能恢复原貌。大批的灌木和其他必须在大树树荫下生存的植物，都会随着大树一块儿消失；还有所有大大小小需要森林才能生存并延续物种生命的动物……

凡是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到的宇宙神妙，因以自我为中心的盲目追逐物欲而变得单调无聊。不久，马和猪，还有小麦和土豆，就要取代林中成千上万的生命——上帝造来跟我们共同生活的动植物。它们也有生存的权利，我们却消灭它们，残暴地剥夺它们生存的希望……难道说造物主在地上创造那么多多样化的生命体，每个都有独特的优点而本身都那么完美，却只不过是为了让它的杰作——人类——将它们永远毁灭？

谭卫道神父 [\[1\]](#)
一八七五年

[\[1\]](#) 谭卫道（1826—1900），又译“谭微道”，本名让·皮埃尔·阿尔芒·戴维（Jean Père Armand David），是法国遣使会教士。清同治元年来华，后为法国政府研究中国博物学，走遍全中国，搜集各种标本。在中国动物、植物方面有诸多发现，最大贡献是1866年在北京皇家猎苑发现麋鹿，以及1869年在四川宝兴县邓池沟发现大熊猫，令西方世界为之轰动。——译者

作者序

我最后一次在野外看到大熊猫，已经事隔多年，但它们^[1]的形象仍然冲击着我的生活。熊猫是一种禀性温和且自足的生物，它们的独特和神秘，至今令我深为感动。虽然我们的熊猫研究只触及它们遗世独立生活方式的皮毛，但如今在动物园或照片上与熊猫重逢，回忆还会源源涌现：雪封的树林，我们翻越笼在雾海中的山岭去追踪动物，一头名叫珍珍的雌体熊猫在竹荫下有条不紊地嚼竹子。然而，昔时的心情不能重现，我的经验也无从完全表达。如果剔除感情色彩，我跟熊猫相处的那几年，恐怕几句话就说完了。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五日，我第一次踏入大熊猫居住的森林。虽然当天我没有看到熊猫，却发现了它们的粪便，也观察了它们吃竹子的地方。四年半后，一九八五年一月十日，是我在熊猫故乡盘桓的最后一天。这期间，头两年我都在卧龙自然保护区做研究——这是中国最大的熊猫保护区，面积达七百八十五平方英里。从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到一九八二年六月，我和妻子凯以及我们的中国同事在区内的五一棚营地做研究。接下来的八个月，我待在美国，为我任职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纽约动物学会^[2]，撰写一篇关于熊猫的科学报告。一九八三年初，我回到中国，继续卧龙的研究，并调查四川省其他熊猫活动区，四川是熊猫出没的主要地区，也是我们研究项目的根据地。这项研究使我们得知熊猫求生的不同生态条件，并帮助我们挑选第二个研究地点——唐家河自然保护区。一九八四年，我主要在唐家河研究熊猫和亚洲黑熊。由于这两个物种的体积和外形接近，我希望把它们生态与行为稍做比较，并确定唐家河熊猫跟卧龙熊猫有无明显的差异。

研究熊猫四年多以后，我把这一项目留给我同事——来自田纳西大学（University of Tennessee）的熊类专家肯尼思·约翰逊（Kenneth Johnson）和在科罗拉多大学（University of Colorado）研究植物学的阿兰·泰勒（Alan Taylor），都在一九八四年加入了这

一项目。肯 [\[3\]](#) 负责监看卧龙的熊猫，我把注意力放在唐家河，阿兰则研究竹子。一九八五年，唐纳德·里德 (Donald Reid) 从卡尔加里大学 (University of Calgary) 来到中国，继续两个保护区的研究工作，约翰逊则参加一项熊猫数量统计，以确定此一物种的实际状态。

我们这群所谓“外国专家”的作用，是从旁协助推动工作，并且把新的科技、观念、技巧介绍给中国同事，而非做长期性的研究。我已经恪尽义务。我们详细记录了熊猫在不同季节所食用的竹子部位，在实验室分析竹子的营养成分，从中得知很多有关熊猫适应竹子生态的复杂细节。我们用无线电遥感勘测法，监视熊猫的动作与日常生活周期，这套方法是给熊猫戴一个内有无线电发射器的颈圈，个别监听它们的信号。我们也厘清了保护熊猫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为缓和这些问题应该采取的步骤。获得基本资料以后，待办的工作就很清楚，其他人会填补必要的细节，执行我们所建议的保护熊猫策略。我必须承认，一旦完成基本观察，我的研究热忱就退烧了。我的心思转移到对我而言更迫切的新目标上，也就是研究西藏高原特有的野生生物。

熊猫项目仍在继续，以中国人为主，偶尔有外国人来插手，我跟这些中国人多半并不相识。我读过他们的报告，看过新闻报道，也从我的同事那里听到一些消息。但我故意不回到我曾投注大量心力的地方。这本不难做到。离开熊猫以后，我仍在中国境内，忙于研究藏羚羊、野生牦牛、雪豹及其他面临生存威胁的高海拔地区动物。为了减弱我和熊猫以及人类相互接触的经验，我觉得有疏离熊猫的必要。身为外国人，而且是唯一的外国人，连续好几个月都只跟中国人接触，我觉得要在这一项目上达到真正的突破非常困难。我自然对中国和熊猫都抱着两种看法：一种是我本来的观念；一种是我在当地的所见所闻。我的观察不见得一直都可靠；我知道其局限，也尽可能随时调整，真相有时会随我的心情一起改变。我希望本书对中国人和熊猫的了解都是基于相互的体谅，这绝非易事，因为中国人和熊猫都体现了兼具斯多葛主义与温暖热情这一令人迷惑的混合特质。

熊猫项目是我所有研究中最困难的一项，不仅因为研究本身观念简单但执行困难，更因为它有两个赞助单位：一个是从北京乃至我们的管区，叠床架屋的政府机构；另一个是远在瑞士，跟熊猫隔着万水千山，却坚持要遥控所有状况的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

（WWF，过去叫作“World Wildlife Fund International”，现在更名为“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世界自然基金会]）。两个机构都对我们的工作缺乏完整的了解，彼此间又经常发生误会。

我长年在不同国家（巴基斯坦、印度、坦桑尼亚、扎伊尔、巴西）研究野生动物，必须跟不同层面的政府官员打交道。生物学家不仅要研究自然，也要促成保护行动，这肯定会为项目惹来麻烦，因为行动一定会涉及政治层面，保护毋宁是社会问题，跟科技或科学的关系反而淡。有时是因为缺乏共同的目标与前瞻而产生问题，有时则因为沟通不良，我都已经习惯。但WWF方面和中国方面，在目的与方法上根本不能沟通的困境，却是我前所未遇的。就我个人而言，我也从未经历过如此诚挚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的人际关系，在处理最简单的任务甚或略微偏离严格规定的路线时，都会遭到重重障碍。我所有的行动都受到巨细靡遗的监视和呈报，只要我在场，就会引起百般戒慎。

当然，一部分问题是因为一九六六年发起的“文化大革命”，这期间中国社会从自我批评到自我毁灭，处于非人所能忍受的压力下，十年动乱的惨痛教训记忆犹新。“文革”打压所有外国事物，跟国外的关系一律被打成反革命，会遭批斗或下狱。一九七八年开始实施“开放”政策，社会发生重大变化。一九八〇年我抵达时的中国，跟一九九一年本书所叙告一段落时的中国，大不相同。最重要的是，八十年代中期出现一股新希望。但五千年文明塑造的中国人特性，里里外外还是没有什么改变；在哲学旨趣上维护尊严，慎终追远，人际关系（尤其跟外国人相处）上保持距离。不过，自从老百姓获得新自由，“多年来极‘左’思想加诸的心理镣铐”渐渐解除，他们谦卑的渴望更有实现的可能，我接触到的中国人不再步步为营，对我这个硬塞到他们中间的外国人，也格外和善。

一九八九年“六四”风波后的八月，我回到中国，城市生活已恢复正常的外表。但气氛也再度恢复到十多年前，人们不敢随便跟外国人交谈；一种郁积在心里的隐忧使他们变得沮丧而苦恼。

熊猫项目紧接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不安的阶段之后开始。我觉得能在这期间置身中国是一种荣幸。它给我一个机会，深入半世纪不曾见过外国人足迹的偏远山区，研究一种国宝级动物。我逐渐能欣赏同事的幽默、圆滑，以及对艰苦环境的任劳任怨。我学着去了解他们，对于那些西方人眼中的冷漠、傲慢、诡诈和应得心理，虽然还未必能消极接受，但也还可以同情。记忆为我过滤掉项目的黑暗面，以及某些令我极为丧气的事。人的记忆在怀旧的情绪中，为何变得如此宽容而理想化？同时，独特的研究环境和迫切的保护问题，都是我喜欢在中国工作的原因，我在中国所花的时间，是我在任何其他国家从事野生动植物研究的三倍。

我并不想把自己说得太宽大为怀或富于同情心；我再怎么仰慕中国，也不至于为执政者辩护。我的友谊不盲目，我对WWF的钦佩，也不足以使我对它处理整个项目的高压态度释怀。如果这本书只谈舍己为人和崇高的启示，只描写大自然的美与绝对的真，到最后又是一头熊猫得救，一场动机高尚的冒险以大团圆告终，一定更容易下笔，也更令人愉快。本来我对熊猫项目的期望也是如此，可惜最后充满幻灭的现实不能尽如人意。

为了忠实呈现整个研究经过，我谈论熊猫政治的篇幅势必跟谈论熊猫本身一样多。保护项目永远逃不掉政治与科学的分歧，所有谈这类项目的书都应该反映两者之间的互动。但是在为了抢救鲸鱼、犀牛及其他命运受公众关注的物种而奋斗的记录中，往往对保护的真正矛盾避而不谈，人类的贪婪与冷漠才是最根本的问题。熊猫已经成为一种高利润产品，本质上跟大象没什么区别，因此也暴露出某些个人与组织不可告人的本质。确实，无论是在科学研究或保护工作中，政治阴影都会对熊猫项目构成干扰，隐瞒这一点，对熊猫就极不公平。我知道任何记录都难免失真，这使我不愿下笔。批评难免惹来不愉快，不被人接受，甚或造成误会。只以观光客身份或短期出差到过中国的读者，对这个国家的印象，可能跟我大不

相同。然而，那些从事教师、记者或其他职业的人，要是在中国居住或工作超过一年，或许能认同熊猫项目面临的困境。但不论读者的背景为何，我都希望能使大家更关心熊猫的命运。

有关濒危物种的书籍不断出版。我对于是否要在这一汗牛充栋的图书分类下再增加一本——更何况写的又是已有详尽文献的熊猫——感到非常迟疑。还有什么其他动物被人类抓到后，都要取个美美、丽丽之类的名字（叠字代表对它们的钟爱）呢？还有什么其他动物不论出生、患病、勉为其难谈个恋爱、死亡，都要经报章媒体大肆宣扬呢？凡是想阅读熊猫资料的人，已经有很多文章和好几本书了。内容最丰富的两本畅销书，一本是莫里斯夫妇（Ramona and Desmond Morris）所著，一九六六年出版的《人与熊猫》

（Men and Pandas），这本书对于西方探险队杀戮和捕捉熊猫的部分所述尤其出色；另一本是克里斯·卡顿（Chris Catton）所著，一九九〇年出版的《熊猫》（Pandas）。此外，近年出了几本圈养熊猫多在自然背景下拍摄的写真集，都很受欢迎。这些书的文字内容有的拉杂琐碎，如拜伦·普赖斯（Byron Preiss）和郭雪岳（Guo Xueyue）^[4]合编的《熊猫的秘密世界》（The Secret World of Pandas）；有的值得一读，如克莱夫·鲁茨（Clive Roots）的《竹熊》（The Bamboo Bear）。我和我的中国同事在一九八五年出版的《卧龙的大熊猫》，是一本科学专著，对本书只大略提及的细节有详尽的描述。

谈已灭绝或濒临灭绝物种的书这么多，似乎冲淡了灭绝观念在大众心目中的严重性：一再重复会使重大事件变得稀松平常。不论我们如何谴责毁灭其他物种的行为，多数人似乎仍然对大自然不以为意。然则购买这些书是否就代表重视大自然？有关濒危物种的论文往往沦为回忆，书中记载的物种真的已从世界舞台谢幕：渡渡鸟（dodo）、旅鸽（passenger pigeon）、大海雀（great auk）以及大海牛（Steller's sea cow）等。我个人对濒临灭绝动物的名单一再扩大是很无奈的；我关心的能力有限。

但这些书有它们的价值。一再重述有一种道德上的必要；忘怀是一种超乎我们所能负担的奢侈；忽略可视为一种虐待。有人以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最后的熊猫》〔美〕乔治·夏勒.pdf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2368.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